

重走中國西北角



▼在敦煌鳴沙山遇見的駱駝隊 汕頭大學 李玲攝

塞外桃源今日行

汕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范東升 陳創藝

汕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採訪組在甘肅最後階段的行程，是從嘉峪關至陽關，即河西走廊的西段。

追隨長江先生的足跡，採訪組於8月7日登上「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1936年長江先生到達此地時，嘉峪關只是一座破敗小城，城關遺址也只為高樓一座，且樓蓋已被大風吹毀，只剩下幾根柱子。如今的嘉峪關城樓已按古籍文獻的記載全面修復，成為旅遊勝地。棱角分明的城磚和修葺如新的樑木，告訴我們古城舊貌已難尋覓，惟有西門城洞內的條石古道上，那因車輪碾壓磨損形成的深深溝痕，令人遙想起當年金戈鐵馬的威武雄壯。

嘉峪關：「破敗小城」藏旅遊新機

嘉峪關的另一勝景為矗立於討賴河邊近56米高懸崖之上的「長城第一墩」。由於討賴河水量日益減少，河床已演變成幾十米深的大峽谷。峽谷之上建有一座懸空鐵索橋，疾風吹蕩，橋身隨之不停晃動，令膽氣不足者望而卻步。

無處可避的烈日，乾燥猛烈的風沙，可吞噬萬物的黃土再加上渾濁稀少的河水，構成大峽谷區景觀的基調。西北地區向來被視為偏遠荒蕪之地，此處嚴酷的自然條件更是難以復加。然而，西部旅遊業正勃然興起，也許能將自然地理條件的劣勢，轉換為人文歷史的優勢。同樣地處大漠荒蠻之中，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城，被稱為世界奇觀。依中國歷史之久遠，文化之豐富，旅遊市場的廣大，如假以時日，河西走廊同樣有望創造出新的經濟奇蹟。

經過一天385公里的行程，採訪組走出夜幕深沉的戈壁灘，望見燈火闌珊的敦煌。長江先生當年在讚美敦煌為「塞外桃源」的同時，也痛惜當地種植和吸食鴉片的惡習，致使社會經濟發展陷入死路。歷經七十六年的滄桑歲月，今日敦煌

早已掃除鴉片經濟的痼疾，不僅依然是西北地區的塞外綠洲，且正向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旅遊城市快速邁進。

敦煌：塞外綠洲嚴重「渴」水

敦煌市的繁榮離不開旅遊業，但無論是莫高窟還是月牙泉，都面臨著水資源枯竭和沙漠化的持續威脅。長江先生曾記述月牙泉「泉深十數丈，終年不涸」，而如今的月牙泉水源主要靠人工補充維持，周邊的低窪處早已乾涸且與周圍沙地合為一體。由於超採地下水以彌補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近20年來，敦煌黨河流域外圍灌區沙化面積擴大了20平方公里，庫姆塔格沙漠每年向敦煌逼近2-4米。雖中央不久前出台保護規劃，計劃在十年內投入47.22億元進行綜合治理，然而到2020年也只能做到敦煌盆地「重點區域地下水較現狀有所回升，月牙泉水深提高到2米以上」。在這場與沙漠化的艱苦鬥爭中，人類不幸居於弱勢，若不想讓敦煌成為第二個樓蘭，還須一代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

黃渠中學：西北教育的理想之花

長江先生在書中曾描述一位酒泉小學教師，「穿一件淺藍色污舊的單布長衫，沒有任何行李……光光的一身冒着風雪上路」，慨嘆西北教育界的清苦算是達於極點。為了解西北農村教育的現狀，採訪組8日下午尋訪了本地黃渠鄉的一所中學。黃渠中學始建於1966年，多數校內建築均為平房，如今正在修建的新教學樓，將是校內唯一一棟三層以上建築。學校的教科書和輔導教材都是免費的，但教學基礎設施比較一般，除木質桌椅外無其他現代化設備。該校擁有一台鋼琴，在鄉村中學並不多見，賀校長對此引以自豪。



▲范長江之子、汕頭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范東昇教授(右)在楊積慶土司之孫楊正陪同下參觀土司紀念館。兩代後人於76年後，齊聚一堂 汕頭大學 李玲攝

「野曲子」登上大雅之堂

蘭州大學 楊寅紅 趙婧 孔姬妮 楊松霖

「阿哥的肉啊！阿哥來時你沒有，手裡提的肥羊肉。」這是昔日長江先生在從甘肅蘭州坐牛皮筏子前往寧夏途中，船上筏工所唱的民歌「花兒」。長江先生形容其為「歌聲高朗，震徹山谷」，這也是「花兒」首次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隨着《中國的西北角》聲名鵲起，「花兒」也從西北走向全國，成為了西北文化的代名詞。

「花兒」又稱「少年」，是流傳在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省區的一種民歌。在對唱中，男方稱女方為「花兒」，女方稱男方為「少年」。這種對人的暱稱逐漸成為回族山歌的名稱，統稱為「花兒」。寧夏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也是重要的「花兒」流行區，它的聲音幾乎一路伴隨着此次的採訪。

長江先生始聽「花兒」是在前往銀川的路上，唱歌的是黃河上駕牛皮筏子的筏工。碰巧的是，記者也是在前往銀川的路上從一位司機師傅那始聽「花兒」。在由寧夏吳忠市前往銀川的出租車上，記者順口問開車師傅：「您會唱『花兒』嗎？」師傅回答：「這您可問對人了。我老家人是同心縣，與寧夏『花兒王』馬學輝同鄉，從小就會唱『花兒』！」在記者的盛情邀請下，這位姓

馬的回族司機開唱了：「哎……賀蘭山嘛刺玫瑰花，刺刺兒把花兒嘛喚下……」一首接一首，嘹亮的歌聲盪漾在藍天白雲中，為記者的旅途增添了無窮的快樂。

首批列入國家非遺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花兒」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這一產生於農牧社會原始古樸的西北民歌，因市場經濟大潮及現代文明對當地生活方式的衝擊，曾一度面臨萎縮。幸而由於蘊含深厚的民族性和文化性，「花兒」在2006年成功被收錄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寧夏本地也開展了一系列保護措施。

寧夏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調查員雷侃老師介紹說：「我們有一套全方位的保護方法：來自鄉間小野的繼承人雖不會樂譜，但能唱出原汁原味的『花兒』，政府和學校會請他們對專業的音樂教師做相關培訓，讓他們掌握之後再去教孩子；回流一些年輕歌星，將傳統『花兒』與現代音樂相結合，為傳統增添時代感，更容易吸引年輕人；我們還編寫了『花兒』教材，刻錄光盤，給予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實實在在的

或許是太想跟別人分享收穫的喜悅，賀盛明很健談，他還給記者算起了經濟帳。

「西紅柿賣給私人的番茄醬廠，加上政府的補貼價，一噸最少能賣四百塊錢。一畝地產六噸多點兒西紅柿。地膜四五元，化肥一百二十元，澆水有政府修的灌溉渠，一畝地一年八十塊錢，可以澆六回，加上農藥其他的，差不多一畝投入四百塊錢，最後一畝地能有兩百多點兒的收入。葵花好的一畝能出六百斤花籽，有大概不到兩千元的收入。一年就忙四五個月，收入差不多四五萬元。」

磴口番茄素是目前國內最好的加工番茄系列，全縣種植面積已發展到3萬畝。而向日葵則是巴彥淖爾市種植面積最大、範圍最廣的油料作物。

賀盛明夫婦眼中的紅色和黃色在磴口，在巴彥淖爾，在河套地區，隨處可見。那是富裕和幸福！

點評：賀盛明夫婦的幸福離不開三盛公水利樞紐工程的支持，西部發展也離不開一系列惠民工程的興建。正因為這樣，賀盛明夫婦的幸福才不是獨有而稀少的。

他表示，雖然學校的條件並不是最好的，但近幾年的升學率都在全市前3名，今年更達到97%。

賀校長強調說，鄉村教師這個職業，並不只是為了飯碗，更是出於一種理想和責任感。他本人就是從從教裡志願來農村任教的，他相信自己作了正確的選擇。採訪結束後，記者不禁想，如果長江先生在天有靈，他一定會稱讚這些辛勤敬業的鄉村教師們。

陽關龍勒村：甜葡萄釀出幸福生活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在長江先生的時代，自唐以後便中斷的由陽關通往新疆的路仍未修好，他並沒有去到此地。如今敦煌至陽關已修成一條平坦大道，除個別路段出現坍塌之外，可謂一路暢通。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採訪組9日來到陽關附近的龍勒村。

龍勒村為敦煌市最富的村莊之一。這裡樹木翠綠成蔭，葡萄園枝葉繁茂再加上較完善的服務設施，成為遠來客人歇息的最佳場所。

記者採訪了從事葡萄種植已20多年的農家樂葡萄的主人潘中明先生。潘先生說，種植葡萄每畝地用水量只是棉花的一半，但收入卻遠高於種植小麥、棉花。靠著早年低價收購和自己開拓的荒地，他現在擁有葡萄園30畝。而越來越多的遊客也帶來新的收入。潘先生一家一年年富裕起來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任建新來龍勒村考察時，曾為他題寫「人勤葡萄甜」，表彰他家勤勞致富。據悉，敦煌2010年全市葡萄累計種植總面積已達8.57萬畝，葡萄掛果面積達4.5萬畝，葡萄總收入約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0%。龍勒村的農民向世界證明，即使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勤勞、智慧與堅韌也能夠生存與發展。

8月10日記者告別河西走廊踏上歸程，短短十天的西北探訪見聞深深印刻在腦海中，留待我們去回味、對比、理解和思考。長江先生當年訪嘉峪關時曾說：「本着認為有意義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作為新一代的新聞學子，我們將牢記。」

點評：七十六年後重走河西走廊，昔日由鴉片經濟統治的地區一改沉疴，展現可喜變化。然而新氣象背後也有新問題，脆弱的生態環境對當地社會發展的制約在文中處處可見。要應對這一難題，除了依靠西北人民的智慧與堅韌，也需要有抓經濟同時保環境的政策，防走「先污染，再治理」老路。西部大開發，呼喚循環經濟。

載體，讓它更容易保留和傳承。」

學「花兒」年輕人漸多

在雷侃老師眼中，如今願意去了解、去學習「花兒」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很多中小學都開設了「花兒」課，一些學校，還成立了專門的對接傳承基地。

「花兒」得到保護也改變了很多「花兒」繼承人的命運。著名的「花兒王」馬學輝老師，本是一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質樸農民，因其精湛的唱功、豐富的「花兒」曲目和演出經驗，被選為同興縣文化館館長。

雖然已經退休，但馬老師仍在為「花兒」的傳承孜孜以求。他說，自己每年仍會招收學生，教孩子們唱歌，領着孩子們參加演出和比賽。他熱愛這門藝術，願意為它發揮餘熱，奉獻一生。

如今，「花兒」已從當年筏工唱的「野曲子」登上了大雅之堂，不僅成了寧夏文化的代表，更是從中國西北角傳向世界的聲音！

點評：范長江在七十六年前就指彼時蘭州筏客已「對於土著的牧畜和初期的農業生活，不感興趣，而對於東方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則不勝其企慕之思。」在都市生活起支配地位的當下，如何保存農村生活中難以用數字衡量的人文要素，勢必成為西部大開發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在田間勞作的賀盛明 作者供圖

楊正與卓尼：60年的情緣與守望

蘭州大學 閻瑞 吳國娟

陝西師範大學 張傑

2011年8月5日，我們追尋長江先生的足跡，來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提起長江先生的卓尼之行，就不能不提當年與他秉燭夜談的楊積慶土司，一位在書中被稱為「聰敏過人、思想開明」的「摩登人物」。在今天的卓尼，楊家的影響依然很大。這份影響的延續，除了得益於幾代土司的努力外，更離不開一個人——楊積慶土司的孫子楊正。

楊正，曾經的卓尼縣長，這位平頭白髮、面帶微笑的60歲老人，看起來與普通人無異，可若追溯他的家譜，你會有驚人的發現：楊正的祖父、父親皆為卓尼土司，外祖父是阿拉善親王，外祖母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妹妹。他的身上，有藏、蒙、滿三個民族的血統。

60年的歲月，譜寫了楊正與卓尼的不解情緣，延續着楊家在卓尼的千年守望。

為民生：鏟除罌粟花

卓尼縣，位於甘南藏族自治州東南部，自古就是水土資源豐富、氣候宜人的沃野。卓尼係藏語，漢意為兩棵油松或油松。相傳卓尼土司的祖先當初從西藏盼巴宗（今達孜縣）起程東來之際，有人告訴他們：「你們一直向東走，可遇到一條大河，那兒有很多的交相（油松）。」待先祖率部族輾轉到達今天的卓尼時，果然遇見了滔滔東流的洮河及成片的油松，遂在此地安頓下來。

1951年，楊正在卓尼出生，在度過了七年無憂無慮的生活後，因1958年的藏區動盪，他被送往遠離甘南的北京，與外祖母一起生活。1978年，楊正考入甘肅師範學院（現西北師範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卓尼中學、縣委、政協工作，官至卓尼縣長。

七十六年前，長江先生見到的卓尼是「鴉片煙佔了主要的面積……經濟與政治基礎，至為薄弱。」而1983年，初任縣長的楊正依然面臨相同景象。彼時卓尼社會混亂、百廢待興。大煙屢禁不止，連縣委大院裡也隨處可見罌粟花。如何徹底鏟除大煙，成了擺在楊正面前的一大工程。

為了全面禁止鴉片，楊正設置獎懲措施，對積極揭發的群眾給予重金獎勵，而對種植、販賣大煙的行為，一律嚴懲不貸。經過兩年努力，卓尼實現全面禁煙。三年任期滿後，楊正回到蘭州，在甘肅政法學院工作，直到今年退休。

重傳統：退休後補課習藏語

雖然離開了，但楊家在卓尼的影響力仍延續不斷。一位老大爺告訴我們說：「楊家為卓尼做了不少事，如果現在還有土司的話，楊正就是我們卓尼的第二十一代土司。」而儘管楊積慶土司衙門如今已改建成博峪小學，但直到今天，博峪人，尤其是老一輩人，仍然習慣稱這裡為「衙門」。

在「衙門」小學裡，一位藏族老阿媽以不甚流利的漢語向記者邊講邊示範楊正摸頂的動作，臉上露出幸福的表情。

楊正說：「當縣長時，我從不給人摸頂，擔心別人以為我搞個人崇拜。現在退休了，我覺得這是村民的一種心願，就同意了。能給一些藏民帶來安慰和希望，於我而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卓尼，就像一根無形的線，始終牽動着楊正的心。退休後他的心願之一是同剛考上蘭州大學藏語專業的女兒一起學藏語。「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必須學會這個民族的語言。藏語是我們的母語，我一直想掌握它，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這時的楊先生，露出孩子般的微笑。

愛卓尼：「這裡比九寨溝漂亮」

卓尼今後的發展仍是楊正最為關心的問題，話題一轉，他又開始滔滔不絕：「發展旅遊嘛，卓尼很有潛力！」對於卓尼的旅遊資源，楊正很自信：「卓尼的溝比九寨溝漂亮，九寨只有兩條溝，而那樣的溝卓尼有七八條，像大峪溝、阿角溝、博峪溝等。只要旅遊設施一跟上，宣傳到位，來旅遊的人就源源不斷！」

楊正希望把卓尼打造成另一個九寨溝，讓這裡的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拍一部關於祖父和那個時代的電視劇，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了解卓尼。

點評：祖父楊積慶雖為土司，然而已是頗受漢文化影響的「摩登人物」；楊正自幼遠離藏區，所受教育與漢人無異，但年老時卻想要學習老祖宗的藏語。漢藏文化在時代交錯中有機融合，楊家的故事可視為甘南藏區乃至大西北百年變遷史的一個縮影。

賀盛明夫婦的紅與黃

蘭州大學 孫亮全 王一婕 蔡雨廷 曹天府

賀盛明夫婦今年最喜歡的兩種顏色，紅色和黃色，是磴口人最喜歡的兩種顏色，也是河套地區農民最喜歡的兩種顏色。紅的是希望，黃的是幸福。紅紅的西紅柿和黃黃的葵花，是賀盛明夫婦眼中最美麗的事物。

賀盛明夫婦一家所在的磴口縣正是在「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上。當年長江先生雖然盛讚這裡「盡是肥美的地方」，卻對黃河的冲刷現象憂心忡忡：「黃河到磴口，轉向東北流。照目前河水冲刷的情形，巨浪已直指磴口後方而來，沖成一大彎曲，如不修堤排水，恐磴口將成河中孤島。」

但於1961年竣工的黃河三盛公水利樞紐工程，破除了長江先生當年的憂慮，結束了河套灌區自古以來無壩自流的憂患，使灌區近900萬畝農田化作「塞上糧倉」。賀盛明夫婦與鄉親們成了這一水利工程的受益者。家住磴口縣協城一社的賀盛明夫婦，一輩子沒有出

過遠門。賀盛明今年63歲，他的妻子61歲。與他們的相遇是在8月6號中午，當時夫婦二人在採摘成熟的西紅柿，而「重走中國西北角」內蒙古採訪組一行四人正沿着鄉間小路徒步前進。

帶著草帽、手套的賀盛明一邊忙着把西紅柿摘到桶裡，一邊與記者攀談起來。

「家裡有多少地？」

「一共30畝，3畝西紅柿，12畝油葵和花葵，剩下的是小麥、葵花這些好同弄的（作物），不像西紅柿這麼佔人。」

「種西紅柿確實麻煩，你們在地裡得忙多久？」

「四十天。我們天天都得來摘，因為天天都有熟的，不摘就爛在地裡了。油葵和花葵就不用管，收割的時候有機具，就像收麥子的聯合收割機，（收割機）一過去直接就是（收穫的）葵花籽。」